

伯纳多特伯爵遇刺案

福尔克·伯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是一位瑞典外交官、贵族和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与20世纪中叶一些最动荡的事件紧密相连。1895年出生于瑞典王室，伯纳多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通过领导“白色巴士”救援行动，谈判释放了超过3万名囚犯——其中许多来自纳粹集中营——从而获得国际认可。他作为中立、富有同情心且务实的谈判者的声誉，使他成为欧洲最受尊敬的人道主义人物之一。

1948年，当新成立的联合国在中东面临首次重大考验时，伯纳多特被任命为**该组织首位正式调解人**。在联合国分区计划和以色列建国宣言后爆发的阿以冲突，迅速升级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部队之间的全面战争。联合国需要一位能在双方之间保持中立的调解人，享有国际尊重，并具备在极端不稳定局势中导航所需的外交技能。伯纳多特在谈判方面的卓越记录、作为瑞典人的中立性以及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经验，使他成为这一敏感且前所未有任务的理想人选。

人道主义与外交成就

在参与阿以冲突之前，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已建立起作为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的持久声誉。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当时他领导了一项大胆的救援行动，从纳粹集中营救出数万人。作为瑞典红十字会副主席，伯纳多特利用其外交关系、冷静的性格和道德勇气，直接与纳粹高级官员谈判，其中包括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

通过坚持、策略和战略中立的结合，伯纳多特在1945年初确保了约**3万名囚犯**从德国营地获释并撤离。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人、法国人、波兰人以及大量在纳粹政权崩溃时面临死亡的犹太囚犯。他的努力以建立一项大胆的救援行动而达到高潮，该行动被称为“**白色巴士**”。

白色巴士项目是一项物流和人道主义创新。伯纳多特组织了一支由巴士、卡车和救护车组成的车队——全部漆成白色并标有大红十字——以在战争混乱中使其作为中立车辆被识别。这些车辆穿越德国和被占领欧洲的危险战区，从拉文斯布吕克、达豪和诺因加默等集中营收集囚犯，并将他们运送到中立的瑞典。巴士的白色是为了有意将其与军事运输区分开来，并表明其人道主义目的——这一想法后来影响了在冲突地区标记人道主义和医疗车辆的现代做法，以根据国际法确保其保护。

伯纳多特的任务并非没有危险。车队在盟军轰炸机的持续攻击威胁和当地纳粹指挥官的阻挠下运作。尽管这些挑战，行动超出了所有预期，拯救了数千生命，并展示了即使与最残暴的政权进行外交谈判也能产生具体的人道主义成果。

由于他的领导力和勇气，伯纳多特在国际上被誉为道德完整性和实际同情心的象征。他在瑞典红十字会的工作体现了中立和人道主义服务的最高理想——这些原则后来指导了他被任命为联合国首位调解人。白色巴士行动不仅拯救了生命，还为战后人道主义法和现代维和实践奠定了基础，使伯纳多特成为人道主义外交的先驱。

联合国调解人任命与1948年任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杰出人道主义工作之后，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已成为国际信任和道德权威的象征。他在中立、外交和同情心方面的记录导致**联合国**任命他为**其首位正式调解人**——这是国际外交中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角色。1948年5月，联合国面临最紧迫的危机：**英国托管结束后以及以色列建国宣言后**巴勒斯坦爆发全面战争。

1947年联合国分区计划（大会第181号决议）提议将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分为两个独立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耶路撒冷置于国际管理之下。虽然犹太领导人接受该计划作为外交胜利和建国的法律基础，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邻国阿拉伯国家**将其视为极不公正而拒绝。

当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约占人口三分之二，而**犹太人**仅占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该计划仍将**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5%**分配给拟议的犹太国家，尽管犹太人口**合法拥有不到7%的土地**。其余部分——主要是阿拉伯人拥有的地区和农田——将成为一个支离破碎且经济薄弱的阿拉伯国家的基础。对于巴勒斯坦人和更广泛的阿拉伯世界来说，这一划分不是公平的妥协，而是殖民撤退阴影下和犹太人大屠杀后国际愧疚感下策划的一种剥夺形式。

对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导层来说，联合国的决定违反了**自决原则**以及人口和领土所有权的现实。它被视为在多数人口既未同意也未被咨询的情况下强加一个外国政治实体。该计划有效地拆解了历史巴勒斯坦的统一，并被阿拉伯人视为始于英国托管并由锡安主义运动赞助的犹太移民浪潮加速的长期剥夺权利过程的高潮。

因此，当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独立，阿拉伯军队次日干预时，战争在阿拉伯世界中不被视为侵略行为，而是抵抗强加的分区并捍卫巴勒斯坦领土和政治完整的尝试。在战争、流离失所和痛苦历史怨恨的氛围中——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被派往作为联合国首位调解人。

尽管他的声誉和真诚，伯纳多特很快遇到了驱动冲突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念的全部力量。**锡安主义运动**中的许多领导人，包括主流民族主义者和**Lehi（斯特恩帮）**等极端派系，相信整个土地**Eretz Israel**，如希伯来圣经所述，是犹太人民的永恒和神圣指定的家园。对他们来说，这一神圣使命优先于任何国际法、政治妥协或外交谈判。分区概念——在他们视为圣地任何部分上承认**阿拉伯国家**——在他们眼中不仅仅是政治让步，而是**精神背叛**。

对神圣主权的这种坚定信念，将伯纳多特的任务置于与许多锡安主义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基础直接冲突中，尤其是地下民兵。尽管如此，他继续致力于在正义与务实之间找到共同点。他的不懈努力导致了**战争的首次停火**，于**1948年6月11日**宣布，暂时停止战斗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到达双方平民。

在停火期间，伯纳多特制定了他的首个**和平提案**，以正义和人道主义关怀原则为指导。他建议**耶路撒冷**因其普遍宗教重要性而置于国际控制之下；**巴勒斯坦难民**应获准返回家园或获得补偿；并进行**领土调整**——将加利利分配给以色列，内盖夫沙漠分配给阿拉伯人——以创造更公平的土地分配。

虽然该计划反映了克制和对妥协的真诚努力，但立即被双方拒绝。阿拉伯政府因其隐含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而拒绝，而许多锡安主义派系，尤其是极右地下组织，将其谴责为对整个Eretz Israel的犹太主张的背叛。在激进圈子中，伯纳多特不被视为和平缔造者，而是神圣命运的障碍——一个敢于干预他们视为圣经预言实现的外交官。

尽管如此，伯纳多特继续相信，如果理性和人性战胜意识形态和复仇，和平是可能的。即使极端组织开始认为他的存在难以忍受，他仍保持对外交的信仰。悲剧的是，他对和平和国际法的承诺很快将他带入与那些相信其使命受上帝祝福因此不可谈判的人的致命对抗。

福尔克·伯纳多特遇刺

到1948年9月，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在巴勒斯坦的任务已将他置于20世纪最动荡冲突之一的中心。作为联合国调解人的角色要求中立，但中立本身在由存在恐惧和神圣信念驱动的战斗中变得难以忍受。敌对双方将他的和平提案视为对其合法性和神圣目的的威胁，而非和解姿态。

对于**阿拉伯国家**，伯纳多特的调解隐含承认以色列国——他们认为这是对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权利的不可接受侵犯。对于**锡安主义运动**，尤其是其激进派系，他的提案被视为剥夺他们相信**神圣应许**给犹太人民的土地。国际机构——或外国外交官——根据政治便利重绘**Eretz Israel**边界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端。

这些团体中最极端的是**Lehi**，也称为**斯特恩帮**，一个长期倡导武装斗争以驱逐英国和阿拉伯力量脱离以色列土地的锡安主义地下组织。Lehi成员相信他们履行了收回整个圣经以色列的神圣职责，并拒绝承认阿拉伯主权在他们视为圣地的任何部分。对他们来说，伯纳多特的和平计划——呼吁耶路撒冷国际控制、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和对阿拉伯人的领土让步——不是外交努力，而是对上帝应许和犹太民族命运的背叛行为。

1948年9月17日，伯纳多特的生活以暴力方式结束。他在联合国标记的车队中穿越**耶路撒冷卡塔蒙区**，与法国联合国官员**安德烈·塞罗上校**同行时，遭到了伪装成以色列士兵的Lehi激进分子伏击。当车辆在路障处减速时，其中一名袭击者——后来被确认为**约书亚·科恩**——接近伯纳多特的汽车并近距离开多枪，立即杀死了伯纳多特和塞罗。

暗杀震惊了世界。伯纳多特手无寸铁，在国际法保护下旅行，仅参与人道主义和外交任务。他的谋杀不仅是对个人的攻击，而是对联合国权威本身和国际维和脆弱理想的攻击。

在直接后续中，由**戴维·本-古里安**领导的**临时以色列政府**公开谴责谋杀，并禁止Lehi和另一大地下民兵**伊尔根**。然而，反应并未达到完全问责。尽管几名Lehi成员被捕，但无人因罪行被定罪。几年内，该组织获得**大赦**，一些前成员在以色列政府中担任职务。

在国际层面，伯纳多特暗杀引发了**愤怒和哀悼**，特别是在瑞典和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向他致以庄严敬意，他的死亡刺激了在冲突地区建立更结构化的维和和联合国人员保护的必要努力。然而，他的任务在政治上仍未完成。他的副手**拉尔夫·邦奇博士**后来接手了他的工作，并成功谈判了**1949年停战协议**，为此邦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伯纳多特暗杀象征了**神圣民族主义与国际外交**的碰撞——根植于神圣权利的世界观与基于妥协和人道主义法的另一世界观之间。他的死亡揭示了在激进意识形态面前道德说服的极限，以及试图在不相容的绝对之间调解的人的危险。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的遗产不仅活在他遇刺的悲剧中，还活在他所代表的理想中：理性胜过狂热，法律胜过暴力，以及即使在世界上最分裂的地方，和平也是值得为之而死的道德命令。

后果与遗产

1948年9月17日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向国际社会发送了冲击波。这是**新成立的联合国**代表在执行和平任务时首次被故意谋杀。对许多人来说，谋杀象征了在仍从世界大战和种族灭绝中恢复的时代国际法的脆弱性。它还暴露了根植于民族主义和宗教主权愿景的新兴以色列国与伯纳多特所体现的和平、谈判和责任全球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瑞典**，伯纳多特的死亡被深切哀悼和愤怒所迎接。他是国家英雄——因战争期间的人道主义努力而受钦佩，并被视为世界事务中的道德声音。瑞典报纸将谋杀谴责为暴行并要求正义。瑞典政府向以色列和联合国提交了正式抗议，但外交谨慎很快缓和了愤怒。在以色列早期，几乎没有国家愿意冒险与这个年轻国家关系，瑞典尽管愤怒，最终让此事在没有进一步对抗的情况下淡入历史。

联合国通过重申其对维和冲突地区代表保护的承诺回应了伯纳多特谋杀。他的副手**拉尔夫·邦奇博士**，一位美国外交官和学者，被任命继续伯纳多特的任务。邦奇的耐心谈判产生了**1949年停战协议**，确立了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停火线。为此成就，邦奇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是首位这样做到的非裔美国人。然而，广泛承认他的成功建立在伯纳多特工作和牺牲奠定的基础上。

在以色列，反应更模棱两可。临时政府公开谴责谋杀并禁止负责的极端团体，但其追求正义有限。尽管**Lehi**成员被捕，但无人因伯纳多特谋杀被审判。几年后，在一般大赦下，前Lehi成员免于法律后果，一些人在以色列公共生活中担任职务——特别是**伊扎克·沙米尔**，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

或许最苦涩的讽刺是**约书亚·科恩**——被确认为向伯纳多特和安德烈·塞罗上校开致命枪击的Lehi激进分子——成为以色列建国总理**戴维·本-古里安**的**密友和私人保镖**。科恩后来在内盖夫基布兹**斯德博克**定居，本-古里安退休的地方；两人并肩生活多年，每天散步和交谈。联合国首位和平调解人的凶手最终保护了谴责谋杀的国家建造者，这一事实揭示了以色列早期的道德伪善。

伯纳多特谋杀的道德和政治影响继续回响。他的死亡展示了**宗教民族主义**与政治权力融合时，如何使妥协不可能并将调解人变成敌人。对于伯纳多特来说，外交是人道主义的延伸——对话和同理心能战胜仇恨和恐惧的信念。对于他的凶手和启发他们的意识形态，土地本身是神圣的，谈判等同于放弃神圣权利。**普遍道德与神圣民族主义**之间的这种碰撞将在中东后续冲突中回响，并仍是和平建设持久挑战之一。

尽管他的死亡悲剧，伯纳多特的遗产活在他帮助塑造的机构和理想中。他的人道主义创新——如**白色巴士**及其对援助行动中立性的强调——为根据国际法标记人道主义车辆和人员以保护的现代

实践铺平了道路。他作为联合国调解人的服务为未来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奠定了基础，并为中立、人道主义准入和活跃战区外交使用设定了先例。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今天不仅被记住为政治极端主义的受害者，还被记住为**道德勇气和国际良知的象征**。他的生活连接了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外交的世界，他的死亡强调了站在暴力和和平之间的人的风险。虽然他在巴勒斯坦的任务仍未完成，但他生活的原则——同情、中立和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坚定信念——对我们时代的每项和平努力仍是必不可少的。

结论

1948年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遇刺不仅是缄默一人，还对他所代表的和平和道德外交理想的象征性打击。他的死亡标志了联合国在仍为维护正义和人性而挣扎的战后世界中调解尝试的首次且最痛苦的失败之一。对于**瑞典**，损失是深刻的个人性质。伯纳多特是国家英雄——一个出身贵族的人，将其地位和影响力用于他人服务。以色列拒绝将其凶手绳之以法，在**瑞典-以色列关系**中留下从未完全愈合的伤口。直到今天，这些关系仍保持冷淡，**瑞典王室从未对以色列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这一罪行持久阴影的沉默见证。

然而，伯纳多特的记忆不仅仅属于瑞典。他也被**巴勒斯坦人民**记住和尊崇，他们视他为少数愿意面对在其祖国上演悲剧的国际人物之一。当**Nakba**——1948年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流离失所——将数十万人从家园撕裂时，伯纳多特在世界外交官中几乎独自坚持他们的**返回权**并谴责永久流亡的不公。他的提案，根植于正义和人道主义原则，为流离失所者提供了尚未实现的尊严和恢复愿景。

为表彰他的同情和勇气，**加沙城**居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伯纳多特伯爵街** (شارع كونت برنادوت)，位于南部**里马尔区**。简单的蓝色标牌，以阿拉伯语和英语书写，数十年来作为对试图为其土地带来和平而死的瑞典调解人的沉默致敬。它不仅象征感激，还象征记忆——伯纳多特道德愿景与其仍在寻求正义的人民持续斗争之间的桥梁。

今天，这条街道——以及周围加沙城的大部分——躺在废墟中。自**2023年**以来降临加沙的破坏以来，里马尔区已化为瓦砾。伯纳多特伯爵街的毁灭不仅仅是标牌的损失；它是记忆的抹除和伯纳多特曾试图阻止的苦难的镜像。

这一图像中有一种悲剧性的对称：一个跨越前线拯救受迫害者的男人，在现在埋在战争废墟下的街道上被纪念。然而，即使在废墟中，他的名字仍存活——如在瑞典、在联合国以及仍相信其使命的人心中一样。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的遗产属于所有尊崇勇气、同情以及无论多么脆弱，和平是我们欠全人类的义务的人。

来源

- Bernadotte, Folke. 前往耶路撒冷. 伦敦: Hodder & Stoughton, 1951.
- 联合国大会. 第181(II)号决议: 巴勒斯坦未来政府. 1947年11月29日.
-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S/773: 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人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进展报告, 根据1948年5月14日第186(S-2)号决议提交. 1948年9月16日.
- 联合国大会. 第194(III)号决议: 巴勒斯坦——联合国调解人进展报告. 1948年12月11日.

- Bunche, Ralph. 巴勒斯坦冲突选定文件, 1947–1949. 纽约: 联合国档案, 1950.
- Segev, Tom. 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 英国托管下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纽约: Henry Holt, 2000.
- Morris, Benny. 1948: 第一次阿以战争历史. 纽黑文: 耶鲁大学出版社, 2008.
- Horne, Edward. 一项出色的工作: 白色巴士的故事. 斯德哥尔摩: 瑞典红十字会, 1949.
- Peretz, Don. 阿以争端. 纽约: Facts On File, 1996.
- 瑞典外交部. 纪念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 1895–1948. 斯德哥尔摩: 国家印刷局, 1949.
- Khalidi, Walid (编). 从庇护到征服: 1948年前锡安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读物. 华盛顿特区: 巴勒斯坦研究研究所, 1971.
- Pappé, Ilan. 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 牛津: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6.
- 联合国新闻办公室. “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 In Memoriam.” 纽约, 1949.